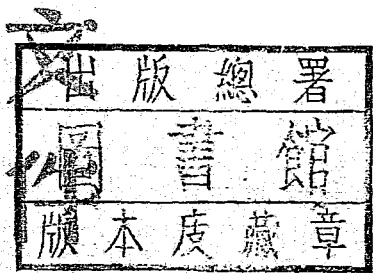


幹部必讀



中共晉綏分局宣傳部印

一九四九·一·一三。

目錄

中央關於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黨內生活第四期）

中央關於建立健全的黨委制的指示（黨內生活第二期）

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列寧論黨和黨的紀律的重要性

列寧引考茨基論知識份子的特徵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

分局關於繼續完成整黨工作的決定（印有單行本）

× × × × ×

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印有單行本）

中國革命的動力

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印有單行本）

恩格斯論對小農的政策

列寧論俄國內部的社會力量



3 2285 0239 3

版年 32341

MG
064
12

列寧論中農及對中農的政策

勝利衝昏頭腦

關於農業社會主義問答（印有單行本）

（附參考文件）

毛主席論工作作風（論聯合政府第七九——八三頁）

關於黨的羣衆路線（七大修改黨章報告第三七——五六頁）

聯共黨史結束語

關於黨的性質問題（七大修改黨章報告第一——二三頁）

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第四節（印有單行本）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的與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二)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衆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單位將所號召者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此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則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便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及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及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典型的具體幹部之歷史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與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員體的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藉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亦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

部隊的領導人員亦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與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向下級具體單位的具體人員、具體事件學習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具體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行政首長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與參加學習的廣大羣衆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羣衆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變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羣衆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則羣衆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又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與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羣衆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與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而這三部分人的比例，又大致都是兩頭小、中間大。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憑藉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領導骨幹，必須是從羣衆鬥爭中（例如整風學習）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羣衆鬥爭所能形成的。任何一個偉大的鬥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與最後階段的領導骨幹，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一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斷地提拔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英雄）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及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自然形成

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比較地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第九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中去。這種領導骨幹的標準，應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羣衆，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無論是執行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其他任何工作，除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均須採取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的方法。

（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向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向羣衆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或方法論。

（五）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在組織中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均必須在此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藉以糾正幹部中在此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許多同志不注重與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

導核心，不注重與不善於使這種領導核心與廣大羣衆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重與不善於總結羣衆鬥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與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後，緊緊地接着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爲官僚主義的領導。此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學會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在以後應用此種方法於一切工作。

(六) 正確的領導意見是從羣衆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意見，這是基本的方法論。在集中與堅持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目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叫別人也是這樣做），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作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羣衆。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於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 任何工作（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防奸工作等等）上級領導機關都應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

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支組、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該使總負責人與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一件工作可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解決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自己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幹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首長，推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員、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都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幹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夠完滿地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一個機關、一個學校、或一個部隊，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個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最中心的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這在該地區、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與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階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及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亦不要不分輕重緩急的沒有中心的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與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與工作秩序，並把這一秩序堅持地貫徹下去，而務必得到一定

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把運用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 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裏不予一一說到，由各地同志根據本決定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鬥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與廣大羣衆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和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與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故爲了反對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科學的領導方法。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列寧曾教訓我們，不僅要教育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領導者，不應當驕傲，而應當了解，我們雖然是中央委員或人民委員，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已具有爲實行正確領導所必要的一切知識。職位本身並不能給予知識和經驗，稱號就更不必說了。

這就是說，只靠我們自己的經驗，只靠領導者的經驗，還不足以實行正確的領導。因此，除自己的經驗，除領導者的經驗以外，還須用羣衆的經驗，用黨員羣衆的經驗，用工人階級的經驗，用全國人民的經驗，以補不足。

這就是說，一刻也不可減弱我們與羣衆的聯系，更不必說隔斷我們與羣衆的聯系了。最後，這就是說，必須仔細傾聽羣衆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平常黨員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所謂「無關重要的人」的意見，必須仔細傾聽全國人民的意見。

什麼叫做正確的領導呢？

這絕對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

正確領導，——這就是說：

第一，必須正確決定問題，而爲要正確決定問題，就非估計到羣衆所有的經驗不可；羣衆是親身經受到我們的領導的結果的。

第二，必須組織正確決定的執行，而爲要組織這種執行，也是非有羣衆的直接幫助不可。

第三，必須組織對於執行這種決定的情形之審查，而爲要組織這個審查，也是非有羣衆的直接幫助不可。

我們，領導者，只是從一方面，可以說，只是從上面看見事物，事變，人；可見我們的眼界，是有很多限制的。反之，羣衆却是從另一方面，可以說，是從下面看見事物

，事變，人；所以他們的眼界，也是有相當的限制。爲要得到問題的正確解決，就必須把這兩方面的經驗綜合起來。只有這樣領導才能是正確的。

……在什麼情形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呢？

一定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就是一定要領導者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繫，一定要領導者是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知識份子有極密切的聯繫。

與羣衆發生聯繫，鞏固這種聯繫，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的意見，——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力量所在及其必勝不敗的原因。

只要布爾塞維克保存着他們與廣大羣衆的聯繫，那他們將一定是必勝不敗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布爾塞維克只要一脫離羣衆，一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的力量，而變成空架子。（「論黨工作的缺點和消滅兩面份子的辦法」）

列寧說過：在組織工作中主要的是挑選人員和審查執行程度。中央委員會在進行組織工作的時候，是以列寧這種天才的思想爲嚮導的。

關於挑選人員和調換那些不勝任的人員這一部份事情，我要說幾句話。

撤銷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對於這件事情我們沒有任何分歧的意見。除了這班人之外，我們還有兩種工作人員，這兩種工作人員阻礙我們的工作，妨礙我

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

第一種工作人員，這種人過去有相當的功績，這種人已成爲功臣，他們以爲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並不是爲他們而寫的，而是爲那些傻子們而寫的。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並不認爲執行黨和政府決議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這樣，他們就破壞黨和國家的紀律基礎。他們敢於破壞了黨和蘇維埃的法律，他們所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希望着，以爲蘇維埃政權，因他們過去的功績而不敢去驚動他們。這些自負的功臣，認爲他們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他們可以破壞領導機關底決議而不受處分。對於這種工作人員怎麼辦呢？應當毫不猶豫地撤換他們的領導職務，不願他們過去的功績。（喊聲：「對呀！」）應當調動他們，降低他們的職位，並把這件事情在報紙上公佈。（喊聲：「對呀！」）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打下這些自負的功臣官僚底傲慢習氣，並把他們安頓在應得的位置上。這件事情之所以必要，爲的是要在我們的整個工作中鞏固黨和蘇維埃的紀律。（喊聲：「對呀！」鼓掌）

現在講到第二種工作人員。我所指的是一種說空話的人，我可以說，這些誠懇的說空話的人。（笑聲）是誠懇的，是忠於蘇維埃政權的人，但是沒有能力來領導，沒有能力來組織什麼事情。去年我曾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是很可尊敬的一個同志，但是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他能够把任何一件活潑的事情淹沒在空談中去。請看這篇談話：

我問：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呢？

他答：關於播種的事情麼？斯大林同志，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末，又怎麼辦呢？

他答：我們曾經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笑聲）

我問：那末，後來又怎樣呢？

他答：我們的工作有轉變，斯大林同志，很快就要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答：在我們那裏有着進步。（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你們那裏的播種事情辦得怎樣？

他答：我們那裏的播種事情，暫時毫無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大笑）

這就是說空話的人底面目。他們動員起來了，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問題，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步，而事情終究還是停頓着。

不久以前，一個烏克蘭的工人所說過的那個組織底狀況，也與上面的情形一模一樣。有人問這個工人在這個組織中是否有路綫，他回答說：「怎麼，路綫……路綫當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見。」（全場大笑）很明顯的，這個組織也有自己的誠懇的說空話的人。

當撤換這種說空話人底職位，派他們遠離行動工作的時候，他們便擺開兩手而帶着

驚奇的神氣說道：「爲什麼撤銷我們？難道我們沒有做了對於事情所必須的一切事情，難道我們沒有召集突擊隊員底集會，難道我們在突擊隊員底代表會議上沒有宣佈黨和政府底口號，難道我們沒有選舉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爲名譽主席團，（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沒有給斯大林同志送祝詞，——你們還要我們做什麼事情呢？」（全場大笑）

怎樣對付這些不可救藥的說空話的人呢？如果把他們留在行動工作上面，他們能夠把任何一件活潑潑的事情沉沒在滔滔不絕的說話底洪水裏面。很明顯的，應當把他們從領導的地位上撤銷，叫他們去做其他的不是行動的工作，說空話的人是沒有做行動工作的資格。（喊聲：「對呀！」鼓掌）

……至於加緊審查執行程度方面將來的工作，那末，關於這一點我要說幾句話。

正確組織審查執行程度這件事情，在與官僚主義及文牘主義作鬥爭的事業上，具有決定的意義。領導機關底決議是否執行，或者被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置諸高閣？這些決議是否正確執行或者被人曲解？機關是否誠懇地並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工作，或者是在那裏空轉？——關於這一切，只有好好地審查了執行程度以後，才能及時知道。好好地審查執行程度——這是一種探照燈，這種探照燈幫助我們隨時查明機關工作底狀況並揭露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底原形。可以深信地說：十分之九的破綻和缺陷，是由於沒有正確組織執行程度底審查工作。無疑義的，如果有了這樣一種執行程度底審查，那末，破綻和缺陷就一定事先被防止了。

但是，要使執行程度底審查達到目的，至少必須兩個條件：第一，要使執行程度底審查是有系統的，而不是偶然的；第二，要使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各組織底一切環節中領導審查執行程度的人，不是次要的人物，而是十分有威信的人，——本組織裏的領導者自己。（在「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審查工作人員，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是什麼意思呢？

審查工作人員，這就是說，不是以工作人員的允諾和宣言為標準，而是以他們的工
作結果為標準來加以審查。

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就是說，不僅是在辦公室，不僅是按他們的形式上的
工作報告來審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地方，按實際的執行結果來審查。

一般說來，是否需要這樣的審查呢？是絕對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為
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透徹無遺地認識工作人員，查明他們的真正品質。其所以
需要，第二，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執行機關的優點和缺點。其所
以需要，第三，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該工作指示本身的優點和缺
點。

有些同志認為，對於工作人員的審查，只可以從上而下來實行，就是領導者根據被
領導者的工作結果來審查被領導者。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從上而下來審查，當然是需要
的，因為這是審查工作人員及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的有效辦法之一。可是，從上而

下的審查，還遠不能概括整個審查工作，除此而外，還有另外一種審查方法，即從下面的審查，就是說，由羣衆，由被領導者來審查領導者，指出他們的錯誤，並指明改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這種審查，乃是最有效的審查工作人員的辦法之一。

黨員羣衆，在積極份子會上，在代表會議上，在代表大會上，審查自己的領導者，其方法就是聽他們的工作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這個或那個領導同志爲領導機關的人員。我們黨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之在黨內確切執行，黨機關之毫無條件地以選舉手續產生；提出候選人以及取消候選人資格的權利；不公開的投票法；批評和自我批評之自由，——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必須確切實行，以便同時也使黨員羣衆易於審查和監督黨領導者。

非黨員的羣衆，在非黨員的積極份子會上，在各種各樣的羣衆會議上，審查自己的經濟工作的、職工會的以及其他的領導者，這些羣衆，在這些會議上聽自己的這些領導者之工作報告，批評缺點，並指出改正這些缺點之辦法。

最後，全國人民，在選舉蘇聯的政權機關的時候，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公開的選舉辦法，來審查自己的國家領導者。

任務就在於把從上而下的審查和從下而上的審查聯系起來。（「論黨工作的缺點和消滅兩面份子的辦法」）

列寧論黨和黨的紀律的重要性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的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器，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認黨這就是說，從資本主義破產的前夜（在德國），一躍而至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不是最低階段，也不是中段）。我們在俄國（推翻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走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最低階段）去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階級還會多年存在。這個時期在英國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仍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趕走地主資本家就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這還要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但這些小商品生產者，是不能驅逐和鎮壓的，而要和他們共居，只有經過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可以（而且必須）改造、感化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他們用這種勢力浸漬無產階級，誘惑無產階級，不斷地使無產階級內部重新發生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散漫、個人主義、由熱心變為消沉等等陋習。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必須有嚴格的集中化與紀律，

以便抵制這種惡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底組織作用（這是無產階級主要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反對舊社會勢力和傳統的持久的鬥爭，流血的及不流血的，強力的及和平的，軍事的及經濟的，教育的及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乃是一種最可怕的勢力。如果沒有一個鐵一樣的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一個爲本階級內全體純潔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一個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就不能順利進行這個鬥爭。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一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小業主從事於日常的、瑣碎的、不可捉摸的、起腐化作用的活動，由於這種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原因。要是有人減弱——即使減弱一點——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他就在事實上幫助着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

（「左派幼稚病」第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頁）

列寧引考茨基論知識份子的特徵

「……現時關於知識界與無產階級間的對抗問題又是我們所非常注意的問題了。我們的同僚們（考茨基自己是一個知識份子，著作家和編輯——列寧）將往往因我承認這個對抗而表示憤慨。然而，須知道這個對抗是確實存在的事實，而企圖以否認事實來瞞塞

這個對抗，那就會是最不適當的策略。這個對抗乃是社會的對抗，這個社會對抗是表現在階級上，而不是表現在個別人物上。無論個別的資本家，或個別的知識份子，都是完全能夠加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當有這樣的事實時，知識份子也就改變自己的性質。而在往後的敘述中所說到的，主要不是這種知識份子，因為這種知識份子迄今還是自己階級中的例外。在往後的敘述中，如果沒有特別的附帶說明，那我就僅僅把知識份子一字了解為普通的知識份子，這知識份子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立腳點的，是知識份子階級底標本代表。這個階級是與無產階級有相當對抗的。

這個對抗，是異於勞資對抗的另一種對抗。知識份子不是資本家。固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資產階級的，而當他還沒有變成是流浪者時，他是不得不維持這種水平的，但同時，他又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的產品，而且還時常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往往遭受着資本家方面的剝削以及一定的社會的賤視。所以，知識份子是与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經濟對抗的。但是，他的生活狀況，他的勞動條件，是非無產階級的，而由此也就有在情緒中以及在思維中的一些對抗。

無產者在他還是孤立的個體時，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自己的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自己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他從組織中，從他與同志們的有計劃的共同活動中汲取的。當他組成爲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底一部份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了。對於他，這個機體就是一切，而單獨的個體，若與這個機體比較

起來，則很少意義。無產者以最大的奮不顧身的精神，以無名大衆底細胞資格，去爭不計較個人利益，毫不圖謀個人榮譽——而進行着自己的鬥爭，他在自己所被指定的任何一個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職責，自願服從着那浸透其全部感覺，浸透其全部思維的紀律。

而知識份子則完全不是如此。他不是以這樣或那樣運用力量的進行鬥爭，而是利用證據來進行鬥爭。他的武器——這就是他個人的知識，他個人的能力，他個人的信念。他只憑靠自己個人的品質，才可獲得相當的意義。因此，在他看來，表現本人個性的完全自由，是順利工作的第一個條件。他只能勉強強以某個整體底附屬部份資格服從這個整體，爲迫於必要而服從，而不是出於本人意願而服從。他承認必須要有紀律，是僅僅對於羣衆，而不是對於上等人。而至於他自己，那他當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

……尼采底哲學，及其對於超人的崇拜——這個超人認爲全部問題都在於保證其自己個性底完全發展，這個超人覺得，使他個人在任何程度內服從任何偉大的社會目的，都是下賤可恥的事情，——這個哲學是十足的知識份子宇宙觀，這個哲學使知識份子完全不中用於參加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

除尼采而外，易卜生也是適合於知識份子情緒的知識份子宇宙觀底出色代表。易卜生底醫生司托克曼（在「人民公敵」戲劇內）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如許多人所想像

的那樣，而是這樣的標本式的知識份子，這樣的標本式的知識份子，是必然會與無產階級運動，一般就是與任何人民運動，——如果他竟企圖在這個運動中有所動作的話，——發生衝突的。這是因為尊重多數同志的態度是無產階級運動——如任何民主運動一樣——的基礎。司托克曼一類的標本式的知識份子是把「固結多數」看作應被推翻的狎獲怪物的。

……李卜克內西是社會主義運動所需要的盡善盡美的知識份子的模範，他週身都浸透了無產階級情緒。他雖是燦爛的作家，但他已把知識份子特有的心理特點喪失無餘。他曾毫無怨言地在行列中行進，他曾在他所被指定的任何崗位上工作，他把自己通通服從於我們的偉大事業，並鄙棄那些按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來的知識份子在落到少數地位時就往往發出的說什麼自己個性受到壓抑的頹唐的嚶泣。在這裏還可舉出馬克思，他是從來也沒有想出風頭，而曾模範式地服從着他在那裏不只一次處於少數地位的「國際」中的黨的紀律。」（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十三章）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爲着實行布爾塞維克化，至少必須努力做到若干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化，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第一、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爲國會選舉機構底附屬物——像社會民主黨在實際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樣，也不能看成爲職工會底不要錢的附加品——如同某些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份子有時對於這點所反覆說的那樣，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負着領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上，自職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

第二、必須使得黨，特別是它的領導者，完全地精通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第三、必須使得黨在製定各種口號和指示時，不是根據讀熟了的公式和歷史上的類比，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的具體條件——國內的和國際的具體條件周密分析的結果，同時必須顧計到各國革命的經驗。

第四、必須使得黨在羣衆革命鬥爭底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底正確性。

第五、必須使得黨底全部工作——特別若是黨裏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還未滅絕的話——改造過來，建築在新的、革命的步調上，它使得黨底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的走向使羣衆革命化，走向在革命的精神上培養和教育工人階級底廣大羣衆。

第六、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要把這與關門主義相混淆！）和與羣衆的最大限度的聯繫及接觸（不要把這與尾巴主義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不僅不可能教導羣衆，而且也不能可向羣衆學習，不僅不可能引導羣衆和把羣衆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羣衆的呼聲，以及推知羣衆的迫切需要。

第七、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要把這與革命的冒險主義相混淆！）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不要把這與遷就行為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便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與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底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利益聯繫起來，並且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第八、必須使得黨不掩藏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而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上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第九、必須使得黨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底優秀份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這些優秀份子是十分忠實的，足以成爲革命無產階級之意向底真正的表達者，並且他們是十分有經驗的，足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真正領袖、善於運用列寧主義底策略和戰略的領袖。

第十、必須使得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底社會成份，清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份子，以便達到最高限度的一元性。

第十一、必須使得黨創立起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基於思想底一致性、運動底目的之明確性、實際行動底統一性及廣大黨內羣衆對黨的任務之自覺態度而成長起來的。

第十二、必須使得黨有系統地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之執行，不然，這些決定和指

示就有變成空文的危險，這只能破壞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對於黨的信任。

沒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條件，布爾塞維克化便是空談。（斯大林：「論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塞維克化」，見「真理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中國革命的動力

根據現階段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對象、中國革命任務的分析與規定，中國革命的動力是什麼呢？

既然中國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所反對的對象主要的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和內部的半封建的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在推翻這兩個壓迫者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那末，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中，有些什麼階級有些什麼階層可以充當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勢力的力量呢？這就是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認清這個革命動力問題，才能正確的解決中國革命的基
本策略問題。

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裏，有些什麼階級呢？有地主階級、有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都是上層統治階級。又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有各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這後面三個

階級，在今天的最廣大領土上，還是被統治階級。

所有這些階級，他們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如何，全依他們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地位來決定。所以，社會經濟的性質，不僅規定了革命的對象與任務，又規定了革命的動力。

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中國社會的各階級。

一、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是封建殘餘的代表，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基礎，是剝削農民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利益的階級。因此，作為階級來說，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而不是革命的動力。

但是地主階級中，最反動的是大地主階層。至於中小地主，特別是破產與半破產的小地主，則有比較不同的情形。當革命還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大地主時，他們往往是能够保守中立或暫時的參加鬥爭的。尤其是從這個階層出身而受過科學教育的知識份子，很多都能夠這樣做。

在抗日戰爭中，一部份大地主跟着另一部份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日寇變為漢奸了，另一部份大地主跟着另一部份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還留在抗戰營壘內，亦已非常的動搖。但是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尚有抗日的積極性，尚值得團結他們一道抗日。

二、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有帶買辦性的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

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家服務並為他們所蒙蔽的階級，他們和農村中的半封建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在中國革命史上，大資產階級歷來不是中國革命的動力，而是中國革命的對象。

但因為中國帶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各個帝國主義的，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地對立着的時候，在革命主要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之下的買辦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一定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戰綫。但一到他們的主子起來反對中國革命時，他們也就立即反對革命了。

在抗日戰爭中，親日派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或準備投降了。歐美派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尚留在抗日營壘內，亦是非常動搖着，他們就是一面抗日與一面反共的兩面派人物。我們對於大資產階級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堅決的打倒他們。而對於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則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一方面是聯合他們，因為他們還在抗日，還應該利用他們一點殘餘的抗日積極性；又一方面是同他們作堅決鬥爭，因為他們執行破壞團結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沒有鬥爭就會危害抗戰與團結。

民族資產階級是兩重性的階級。

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殘餘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

國主義與封建殘餘有矛盾。從這一方面說來，他們是革命的動力之一，在中國革命史上他們也曾經表現過這種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積極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所以，他們又沒有澈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這種情形，特別在民衆革命力量強大起來的時候，表現的最明顯。

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他們可以成爲革命的一種動力。而在另一時期，就有跟在大資產階級後面，作爲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險。

但是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主要都是中等資產階級，他們雖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跟隨着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對過革命，但是這個階層基本上還沒有掌握過政權，而受當政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時期內，這個階層不但與大資產階級投降派有區別，而且與大資產階級頑固派也有區別，至今仍是我們的較好的同盟者，因此對於這個階層採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各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

其中有知識份子、有城市貧民、有職員、有手工業者與自由職業者、有小商人、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同農民階級，都受帝國主義、封建殘餘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日益走向破產沒落的境地。

因此，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之一，是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小資產階級也只有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各種類型的沒有把農民包括在內的小資產階級。

第一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

數十年來，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知識份子羣與青年學生羣，在這一羣人中間，除去一部份接近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並為他們服務而反對民衆的知識份子外，一般是受帝國主義封建殘餘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使他們遭受着失業、失學的威脅的。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的有了現代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能够起着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顯明的例證。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份子與半知識份子，能够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傳播與接收，首先也是在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與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份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知識份子在其未與民衆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民衆利益服務並使其生活羣衆化之時，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革命知識份子雖有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份子都能參加革命到最後勝利的，其中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時，就往往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

極態度，其中少數人竟會變成革命的敵人，陳獨秀，張國燾就是這少數知識份子的代表。知識份子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自大性，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羣衆鬥爭中才能洗刷乾淨。

第二是城市貧民。

這個階層中，包括破產了的手工業者、小販、離鄉別井到城市尋找職業而不得的農民，以及大羣依靠不定勞動維持生活的苦力。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羣衆，他們的地位大體上和貧農的地位相當，是一種半無產階級。他們的地位推動他們起來擁護革命，並使他們容易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他們是很好的革命力量，和貧農一樣，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第三是職員。

工商業機關中的職員，國家機關與文化機關中的廣大月薪生活者，都屬於這一類。他們是依靠出賣精神勞動或技藝而生活的人，是不剝削他人的。他們受失業威脅又非常之大，因此，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這一類人是一個相當廣大的羣衆。經濟建設、國家建設與文化建設，是不能離開他們的。

第四是手工業者與自由職業者。

手工業者獨立生產者，是一個很大的羣衆，是現時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担当者。他們不但遭受外國商品競爭的打擊，而且無力擺脫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羅網，所以他們能夠

站在革命的方面，他們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他們當中的一部份是雇用少數工人的，另一部份則是不雇工人的。這後一部份人，是更加可靠的同盟者。

自由職業者例如醫生等人雖是他們在思想意識上常常受着資產階級的影響，但他們與手工業者屬於同一範疇的，也是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部門，也是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壓迫的，所以也可以成爲革命的力量。

第五是小商人。

他們一般是受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且是一個很大的羣衆。這一階層的下層份子，是不剝削別人勞動，而遭受高利貸剝削的，所以他們在革命中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只有那些剝削他人勞動而又同帝國主義買辦階級或封建殘餘有聯系的土層份子，才是對革命表現動搖態度的人們。

四、農民階級

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佔百分之八十，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担当者。

農民一般都是小資產階級，但他們的內部是在激烈分化的過程中。

第一是富農。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連地主一起共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稱爲農村資產階級。中國的富農大多帶有半封建性，並與城市資產階級聯系着。但革命政府不應把富農看成與地主無分別的階層，不應過早採取打擊富農經濟的政策，因爲富農的生產在一定時期中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是中農。在中國農村人口中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中農一般不剝削別人，在經濟上能够自給自足（但在年成豐收時能有些許盈餘，有時也利用一點僱傭勞動或放一點小債），而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剝削，除一部份富裕中農外，多是土地不足並沒有政治權利的。中農不但能夠堅決參加反帝革命與土地革命，並且是能夠參加社會主義革命的，因此全部中農都可以成爲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中農是很好的革命動力之一。中農態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後，中農成了農村中的大多數的時候是如此。

第三是貧農。中國的貧農連同雇農在內，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農村羣衆，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中農和貧農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無產階級也只有同中農、貧農結成鞏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到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農民這個名稱所包括的內容，主要的也正是指的中農和貧農。

五、無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中，現代產業工人約佔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城市手工業雇傭勞動者，約佔千二百萬，此外還有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有他的許多特出的優點，使他在中國革命中能夠成爲領導的力量。

中國無產階級有那些特出的優點呢？

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與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特別堅決和特別徹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又沒有西歐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但須注意，中國民族改良主義有時容易在一部份工人中發生影響），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臺，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爲中國社會裏最有覺悟性的階級。

第三，中國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由於剛從農業破產出身的成份佔大多數），便利於他們同農民結成親密的革命聯盟。

因此，雖然中國無產階級有其不可避免的弱點，例如人數較少（同農民比較）、年齡較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比較）、文化水準較低（同資產階級比較）；然而他們終究成爲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動力，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參加與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遠之如辛亥革命，因爲當時還沒有無產階級的自覺的參加，因爲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所以流產了。近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因爲這時有了無產階級的自覺參加，因爲這時已經有了共產黨，所以在一個時期內取得很大的勝利。但又因爲資產階級後來背叛了他們同無產階級的聯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綱領，同時也由於那時

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還沒有豐富的革命經驗，結果又遭受了失敗。抗戰以來，因為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所以團結了全民族，發動了與空持了偉大的抗戰。

中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完全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就必須在各種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革命的階級與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一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

中國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國農村中與城市中廣大的失業人羣，在這個大羣中，有許多人被迫到沒有任何謀生的正當途徑，不得不尋找所謂不名譽的或不正當的職業過活，這就是乞丐、盜賊、流氓、娼妓與許多迷信職業家的來源。這個階級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份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其另一部份則頗有革命性。但是他們缺乏建設性，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就又成為流氓主義與無政府思想的來源。因此，應該善於引導他們，注意組織他們的革命性，而防止他們那種不正當的破壞性。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對於中國革命動力的分析。（節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第四節

恩格斯論對小農的政策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協作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予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其所以要這樣來作，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有可能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人數愈多，社會改造也就會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點，讓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的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我們在這方面爲着農民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公款，這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物質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著『農民問題』）。

『列寧主義問題』第一分冊六一——六二頁）

列寧論俄國內部社會力量

我們現在且把對於我們很有利的國外政治與國際情況的力量放在一邊，不列入討論範圍之內，這種不列入討論是很正公的，因為這裏的問題是關於俄國內部社會力量的問題。請看這些內部的社會力量吧。反革命方面有專制制度皇室，警察，官僚，軍隊和高等豪紳。人民中不滿情緒愈深刻，則軍隊也無希望，官僚中的動搖也就愈大。其次，資產階級現在是完全擁護革命的，極力在呼籲自由，常常是在代表人民說話，而且甚至代表革命說話。但我們都是馬克斯主義者，由理論上知道，而且每天每時都看到我們的「自由派」、「地方自治派」、「解放派」的例子，都知道資產階級之擁護革命是不徹底的，是自私自利的和怯懦的。全部資產階級，只要一滿足了自己貪婪的狹隘的利益，只要一「離開」徹底的民主主義（它現在已經開始離開了！）它必然就會即刻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制度方面來反對革命，反對人民。剩下的祇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是有能力獨立支持到底的，因為它能使民主革命繼續發展下去。因此無產階級站在革命的前列為共和國而奮鬥，它以藐視的態度拒絕一切愚笨而毫無價值的，要它去計較到資產階級是否會離開革命的勸告。農民本身包括有許多半無產者分子，同時也包含有小資產階級分子。這使得它也是不堅定的，使得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

嚴格的階級政黨。但是，農民的不堅定性是與資產階級的不堅定性根本不同的。因為農民在現時所需求的，與其是無條件地保存私有財產制度，倒不如奪取這個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雖然農民並不因此而成為社會主義的，並不因此而停止為小資產階級的，但是它能成為民主革命⁽²⁾完全的和最急進的擁護者。只要是啓發農民的革命事件的進程，不因資產階級的叛變與無產階級的失敗而中斷得太早，那末農民必然會成為這樣的擁護者。在這種條件之下，農民必然會成為革命與共和的柱石，因為只有獲得完全勝利的革命，才能給農民以土地方面的一切，滿足農民自己所需要的及其日常所想像的一切，才能給農民以農民所希望的，農民所想像的，為農民所真正必需的一切。他們需要這些，當然不是如「社會革命黨」人所想像的一樣，是為着消滅資本主義，而是為着脫離半農奴制之束縛，脫離鞭笞與下賤的黑暗生活，以便於在商品經濟所允許的範圍內，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

不但如此，不僅急進的土地改革促進農民走向革命，而且農民的一般的與日常的利益，也推動它革命。甚至在協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農民還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確切表現農民的利益，才能表現它在人民中是廣大的羣衆，是人民中的大多數。農民的智識程度愈高（自日俄戰爭以來，他們的智識程度正在迅速提高，這種速度，許多用學校尺碼來度量智識的人們，是意想不到的），則他們對於完全的民主的擁護也就愈徹底，愈堅決，因為農民不像資產階級一樣，害怕人民統治，而人民統治對他是有利

的。只要人們一旦從原始的君主制度中解放出來，則民主共和國就會成爲農民的理想，因爲俄國買賣的資產階級自覺的君主制度（有上議院等），使農民還是一樣的沒有權利，一樣的受壓迫，一樣的黑暗，僅僅少許塗上一點歐洲憲法的顏色罷了。

所以，資產階級作爲階級看，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會跑到自由主義保皇黨的翅膀底下，而農民作爲羣衆看則必然要跑到革命共和主義的政黨領導之下。所以資產階級不能進行民主革命到底，而農民能實行革命到底，而且我們應當用一切力量在這方面去幫助農民。

（「兩個策略」一三五——一三八頁）

列寧論中農及對中農的政策

決定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和中農的政策之基本區別——完全剝奪資產階級和聯合不剝奪別人的中農——這個基本路線是任何人都同意的。但這個路線在實際工作上，却沒有一致遵守，而許多人還不知道如何在鄉村中去遵守它。當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鞏固了政權，而從各方面來創造新社會時，中農問題便提到了第一位，在盛行大規模農業和盛行小規模農業不同國家中，建立共產主義，就要採取不同的道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的。這是一個基本的真理，從這個真理引伸下去，一觸到建設共產主義的問題時，我們的主要注意力在某種程度上就恰恰應該集中到中農的身上。

……當我們遇到像中農這樣一個階層的時候，我們便發現它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中農一方面是私產者，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它不剝削別人的勞動者。幾十年來中農極具艱苦地守着自己的地位，他忍受過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忍受過一切。可是，他終究是一個私產者。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動搖階級的態度，便有許多困難。由於一年多的經驗，由於六個多月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工作，並由於鄉村中階級已開始分化的事實，使我們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應該禁止急燥，禁止拙劣的理論空談，以及禁止把正在完成着但還沒有完成的事情，當作已經完成了的事情。

……強迫用之於中農是非常有害的。這是一個數目龐大的階層，包括着千百萬個工人。甚至產業最興盛的歐洲，技術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鐵路都異常發達，最易使人作如此想。可是，就在那裏，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一個人曾提議過對中農採取強迫的辦法。……

強迫辦法在這裏是全無成效的，我們應該特別強調這個真理。這裏是經濟工作，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這裏並沒有那種上層建築物，可以把它剷除，而建築的基礎仍穩固不動。在城市裏，代表那種上層建築的，就是資本公司，而這裏是沒有那種資本家的，所以，強迫辦法在這裏就要破壞全部革命事業。這裏所需要的是長期的教育工作。……

……一句話，最愚蠢的就是在中農的經濟關係上使用強制手段的觀念。（列寧：「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首先常常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是中農呢？

自然，黨的同志們常常提到，他們曾如何在農村中被問過什麼是中農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不剝削別人的勞動，不依靠別人的勞動來生活，不以任何形式利用別人的勞動果實，而全靠自己的勞動來工作和生活的，就是中農。

這樣的農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比較現在少，因為那時大多數農民是屬於窮苦的貧民階層，和現在一樣，那時只有極少數是屬於剝削者富農階層的。

自從土地私有制廢除以來，現在中農正在增長着。蘇維埃政府已毅然決定，無論如何要和中農建立完全和平融洽的關係。不言而喻的，中農決不能馬上就接受社會主義，因為他墨守舊習，對於一切革新，都遲疑不定，如果不首先在實際上在被邀參加的行動中考驗過，並確信了有改變的必要時，決不改變其生活方式。

因此，我們所必須了解，必須牢記及實行的，即工人共產黨員在鄉村中出現的時候，他們的責任就在於寬取和中農的同志關係，建立和中農的同志關係；他們的責任就在於牢記着，一個不剝削別人勞動的勞動者，就是工人的同志，我們能够而且應該以真誠互信相感召，達到自發自願的聯盟。共產主義政府所提出的任何辦法，祇應看作是忠告，看作是對中農的一個指示，看作是告訴中農應該採用新制的一種勸告罷了。

只有在實際上以共同工作來考驗這些辦法，審查他們的缺點，改正可能的錯誤，

得和中農的協調——只有這樣的工作，才能夠保證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是蘇維埃政府的主要力量和堡壘。這個聯盟是一個保證，是社會主義改革事業，戰勝資本和取消一切剝削形式的事業能夠勝利完成的一個保證。（列寧：「什麼是中農」，一九一九年）

勝利衝昏頭腦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講蘇維埃政權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勝利。就是我們的敵人，亦不能不承認我們所得到的嚴重的勝利。實在的，這些勝利是很偉大的。到今年二月二十日止，全蘇聯農民經濟已經集體化了百分之五十，這是事實。這就是說，到今年二月二十日止，我們已經超過了五年經濟計劃所規定的一倍以上。

到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止，集體農莊在春耕時，已經播散了三千六百萬石的種子，這大約佔計劃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等於二萬二千萬普特的種子。在順利的完成了收買食糧的計劃以後，只是在集體農莊方面，就能夠收集二萬二千萬普特的麥種，不能不承

認這是個很大的成績。

這些事實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告訴我們說：使鄉村轉變到社會主義去的根本轉變，已經可以認為是有保障的了。

這些進步對於我們國家的命運，對於領導我們國家的整個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本身，都有很重大的意義，這是用不着證明的。暫且不講直接的實際結果，只就牠們（這些勝利）對於黨的內部生活，對於我們黨的教育方面來說，也有很大的意義。這些勝利鼓舞起了我們黨的勇氣和對於自己力量的信任。牠們用對我們事業勝利的信仰心武裝了工人階級。牠們爲我們黨引來了幾百萬新的後備軍。

由此，黨的任務就是：鞏固已得到的勝利，並且有計劃的利用這些勝利，使牠更向前發展。

可是這些勝利亦有牠的不好方面，特別是當這些勝利來的比較「容易」，或者是一出乎意料的時候。有的時候，這些勝利使我們很容易發生自大和驕傲，以爲：「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這些勝利有時醞釀了人們，而人們就因此弄得頭昏顛倒，失去了度量的感覺，失去了了解實際情形的能力，發生了過分的看重自己的力量和看輕敵人力量的趨向，表現出冒險主義的企圖，以爲「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問題。這樣的一來，對於鞏固已經獲得的勝利，和有計劃的利用這些勝利，使牠更向前發展，這種顧慮，自然亦就沒有了，爲什麼我們要求鞏固已經得到的勝

利——我們「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

由此，黨的任务就是：向這些對於事業有害的和危險的情緒，進行堅決的鬥爭，從黨內把他們驅逐出去。

當然不能說，這種有害的和危險的情緒，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已經散佈很廣了。然而，這些情緒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同時沒有根據來肯定說，這些情緒不會繼續發展下去。如果這些情緒在我們隊伍中被認為是正當的，那麼，毫無疑義的，集體農莊的事業就會大大的減弱，集體農莊破壞的危險，也將變成實際。

因此我們的刊物的任務，就是：有系統的揭露這種情緒和其他一切類似的反列寧主義的情緒。

舉幾件事實：

一、我們集體農莊政策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正是因為這種政策是依靠着集體農莊運動的自願性和對於蘇聯境內各區域特殊條件的估計。不能用強力來組織集體農莊。如果這樣，那就是愚蠢和反動的。集體農莊運動應該依靠基本的農民羣衆積極的幫助。不應該把集體農莊建設發達的區域內的模樣，機械式的搬到不發達的區域內去。如果這樣，便是愚蠢和反動行爲了。這種「政策」，一下子就會使集體農莊的思想烟消雲散。在決定集體農莊建設的速度與方法的時候，必須小心的研究蘇聯各區域中特殊的條件。出

產五穀的區域，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比一切區域都先進。爲什麼？第一，因爲在這些區域內，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穩固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正因爲這個緣故，農民才能够相信新技術的意義與力量，相信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意義與力量。第二，因爲這些區域，在收買食糧的運動中，有了兩年來與富農鬥爭的經驗，這自然不能不使集體農莊運動專業的進行，更加容易些。最後，因爲在這些區域中，最近兩年以來，我們從工業中心裏，加派了大批優秀的幹部人材去工作。不能夠說，在其他的區域內，譬如：在我們北部的消費區域，或者是落後的民族區域，例如土耳其斯坦，也有這些順利的條件呢？不能，這是不能夠說的，很明顯的，對於蘇聯各區域的特殊條件加以估計的這個原則和自願性的原則同樣是健全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

但是，事實上有時是怎樣的呢？可不可以說，自願性和考察各地的特殊情形的原則，未在許多區域內被破壞過呢？不，可惜不能夠這樣說，舉例來說罷，大家都知道，北方消費地帶的許多區域裏，立刻組織集體農莊所必須的順利條件，比較在五穀區域內要少些。但在這些區域內，往往不去進行組織集體農莊的準備工作，而却代以官僚式的辦法，來命令集體農莊運動，作些關於集體農莊發展的空決議，組織紙面上的集體農莊，事實上這些集體農莊並沒有存在，可是，關於牠的「存在」，却有一大堆吹牛的決議。或者我們再拿土耳其斯坦幾個區域來講，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比較北方消費區域更要少些，大家都知道，在土耳其斯坦幾個區域內，曾有過這種企圖，就是想用

軍事力量恐嚇辦法，剝奪那些不願意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的灌田水和工業品，企圖這樣的「趕上和趕過」蘇聯先進的區域。這種軍閥式的壓迫「政策」，與黨根據自願性考察各地特殊情形而進行的政策，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呢？自然在他們中間，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誰需要這種曲解黨的路綫，官僚式的命令的集體農莊運動，用恐嚇的方法來對付農民呢？除了我們的敵人而外，甚麼人都不需要！這些曲解可以得着什麼結果呢？這只有使我們的敵人強大起來，並且會使集體農莊運動的思想消滅下去，這些曲解路綫的人們，自稱為「左派」，而事實上是幫助右傾機會主義，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二、本黨政治戰略的一個極大好處，就是在每個時期，黨都會去選擇運動中的主要點，抓着這一點，然後再推動全部運動，向一個總的目標進行，以便解決問題。能不能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的系統上，已經選定了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呢？可以這樣說，而且應該這樣說。這個主要點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土地公耕社呢？不是的，不在這裏。在土地公耕社裏生產工具並不社會化，牠已經是集體農莊運動過去的階段了。這個主要點是農業公社嗎？也不是的，也不是農業公社。農業公社目前還是集體農莊運動中單個的現象。如果農業公社成了普遍的形式，那麼不僅僅是全部生產已經社會化，而且分配也社會化了，這種條件還沒有成熟。集體農莊運動目前的主要點，牠的普遍的形式，而且是我們現在應該培植的。就是農業勞動組合。在農業勞動組合裏面，主要的生產方法已經社會化了，這主要的是與五穀經驗有關的，例如，勞動，土地使用，機器及其他

農具，牲畜，經濟建築物等。在這裏而沒有社會化的還有：園藝地（如小菜園，菓園等），住房，一部分的奶牛，小牲畜，家禽等。勞動組合所以是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因為他是解決五穀問題最適宜的形式。而五穀問題又是全部農村經濟系統中的主要點，因為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無論是畜牧事業（小的或大的），或供給工業原料的特別農產物與原料植物的問題，都是不能解決的。因此農業勞動組合，在目前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點。今天所公佈的集體農莊的「模範章程」，就是由此出發的。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也應該由此出發，他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認真的研究這個章程，澈底的實行這個章程。

現在黨的意見就是這樣。

能不能夠說，黨的這個意見，在實行的時候，沒有什麼破壞和曲解呢？可惜，我們不能這樣說。大家都知道，在蘇聯許多區域內，爲實現集體農莊而作的鬥爭，還說不上已經完結，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在那裏有一種企圖，要想超過勞動組合，一下子就跳到農業公社去。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他們就動手把住房，小牲畜，家禽等「社會化」了，而這種「社會化」祇變成了紙頭上的官僚式的命令，因為還沒有必要的條件，可以實行這種社會化。有人以爲在集體農莊中五穀問題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已經是過去的階段，目前最主要的任務，不是解決五穀問題，而是畜牧與養家禽的問題了。現在要問，什麼人需要這種頭昏顛倒的「工作」把集體農莊運動的各種形式都混在一起呢？

什麼人需要這樣糊塗的對事業有害的向前臨跑呢，當五穀問題還沒有解決，集體農莊的農業組合的形式還未鞏固的時候，把住的房子，取奶的牛，一切的牲畜家禽等，都社會化起來，用這樣的方法來挑撥集體農民這種「政策」只是對於我們可恨的敵人適當才有利，難道這還不明白嗎？有一個急於要社會化的人，甚至於到了這樣的地步，他甚至於在勞動組合裏下了一個命令，「限三天以內，把每個農家的家禽，按頭計算出來」，指出一些專門的「司令」來管理計算和監督，「在勞動組合中掌握最高的領導」，「領導社會主義的鬥爭，不要放棄戰地」，——很明顯的，這樣就把整個勞動組合，緊握在一個拳頭裏了。這是什麼，是領導集體農莊的政策呢，還是破壞牠和使牠失掉信仰的政策呢？至於那些組織勞動組合的事業從摘取教堂的鐘作起的「革命家」，就不用我再來說了，摘教堂的鐘，你們想一想，這是怎樣的革……革……革命呵！

怎樣能够在我們的隊伍裏，發生這樣一些昏頭昏腦的「社會化」的行動，和怎樣發生這種可笑的，想跳過自己 and 想避免階級和階級鬥爭，而在實際上是幫助我們階級敵人的企圖呢？只有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輕易」和「出乎意料」的勝利的條件之下，才能夠發生這類行動。牠們的發生，是我們黨內一部分昏頭昏腦情緒的結果：「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牠們的發生，僅僅是因為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並且牠們一時失掉了理智的明確性和穩健的觀點。

為要使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路綫更正確，就必須要徹底的消滅這些情緒。

這就是黨現在的主要任務之一。

領導的藝術是很嚴肅的事情，不可以落在運動後面，因為落後就是脫離羣衆。但是也不可以跑得太向前了，因為太跑向前了，就是與羣衆失了關係。誰想領導運動，同時想與廣大羣衆保持關係，那麼就應當在兩條戰綫上鬥爭——既要反對落後，又要反對跑得太遠。

我們黨之所以有力量，誰也不會戰勝我們的黨，正因為他在領導運動的時候，能夠保持和擴張與千百萬的工農羣衆的聯系。

（斯大林選集，四卷一二三——一五四頁）

年	1949
月	1
類號	4-002

7
162

SKBC
IG
064
2